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duc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 许学强 叶嘉安 林琳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 与规划教育

许学强 叶嘉安 林 琳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 / 许学强, 叶嘉安,

林琳编.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ISBN 7-112-07905-5

I. 全... II. ①许... ②叶... ③林... III. 城市规

划—研究—中国—文集 IV. 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815 号

责任编辑: 姚荣华 杜 洁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刘 梅 王金珠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
与规划教育**

许学强 叶嘉安 林 琳 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天成排版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15½ 字数: 472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9.00 元

ISBN 7-112-07905-5

(1385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寄语中青年城市学者

(序一)

首先,祝贺“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城市规划的大好时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城市规划科学,城市规划也从未具有像今天这样的重要性。要说清以上观点可能颇费唇舌,但点到为止,大家也可基本上明白其中的缘由。

以下,作为一个已进入老年的城市规划探索者,寄语我们的中青年城市学者。

1. 对于城市规划的学习,如能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要将自己的知识系统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系统,并随着学习的增进,不断打破、重构、丰富自己的知识系统,这样就能开卷有益,常学常新,与时俱进。

2. 现在学校课堂上讲授的《城市规划概论》和一般的城市规划教科书,其中讲得好和写得好的,可以作为城市规划学习的入门,但如需要进一步应用,这类知识还远远不够。这时就需要学习者针对具体问题,在有关方面加以拓展。城市规划科学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已经不断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如能够自觉地将这些相关学科和相关部分整合,就会逐步将能够理解的那部分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系统。这种新的学习观是可持续的,有助于知识的成长。

3. 在学习上要有所作为,要逐步养成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事物,从它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就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前及其发展;还有,世界是整体的,地区、城市,城与乡都是整体的,都是互相关联的,要培养树立整体观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科学的发展观,五个“统筹”,归根到底是要整体地认识事物,因此,哲学修养对我们城市学者就非常重要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学习不能离开实践。为了追求真理,要尽可能地采用不同方式参与实践。一个人要善于同其他人合作,城市规划者更应如此,绝不能自恃才高,孤芳自赏,看不起别人。与之相反,需要虚心求教。为了更好地学习与工作,在集体工作中甘当配角,却每每能学到一般所学不到的知识。

5. 关心、熟悉自己所在的城市,从对城市的基本情况了解做起,从探索问题做起,可以观察到事物的演化过程,这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依此类推,我们也需要熟悉本地区的城市,熟悉全国的城市,并常常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做比较,进行比较研究。

6. 城市问题所在,就是城市科学发展和努力的目标所在。对中国城市问题和世界城市问题的时时关注,总是开卷有益。常常并不是能够立刻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勤于思考,关注新事物的发生,对所出现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对未来的追求,都将有助于获得解决问题的有益启示。

城市是不断发展的。以我自己从1940年开始学建筑,1943年开始学习城市规划课程的经历来看,每个时期人们都在憧憬未来,研究未来,从抽象到具体,方方面面。现在回顾起来,事物发展似乎在不断加快,在今天对全球化形势下,更是扑朔迷离,变化复杂。对未来的研究都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在对未来预测时出现的偏差,如历史学家H·G·威尔斯、汤因比等。城市规划学者更是如此,如勒·柯布西耶对巴黎中心区的改造设想等。这说明预测的不确定性,即使大学问家、大师也在所难免,因此不能迷信已有的结论。但是,城市规划又是基于历史经验探索未来的科学,不能对现实问题无动于衷,对未来无所预测,仍需要依据有限的知识来进行未来发展。

展的判断，尽管论断是暂时的，是需要不断调整的。随时注意修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每每获益颇多，就可多少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逐步前进。

7. 在此，我常常感到，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创造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的城市学者们在总结过去、研究现在、探索未来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当然，这种创造力不是毫无根据的乱冲乱撞，而是建立科学的、逻辑的、在人类丰富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有了上述这一条，我们就不会陷入对现实问题的悲观失望之中，而是会带着审慎的乐观情绪去创造未来。

8. 正如普利高津所说，“现在是一个向进化和发明开放的宇宙”。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迹象是科学现在能够把与其他文化传统相联系观察能力集中起来，能够促使世界经历了不同进化路径的各部分互相尊重和理解。因此，我们对于未来的城市希望是一种双重的复兴——科学与人文的复兴。

吴良镛
于会议前夕
2004年5月25日

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探讨城市规划教育， 提升城市规划水平

(序二)

由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十年一次的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已经举行了三次。每次会议因应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有不同的主题，参加人员大部分也不相同，但会议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即探讨城市规划教育，提升城市规划水平，为我国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服务。这每十年一次的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亦见证了我国不同的城市发展与规划阶段，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和规划教育作出贡献。

一、动员更多的学科培养城市规划人才

从1949年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合格的城市规划队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就投入城市规划的人员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和领导力量，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但是，由于较长期的左倾思想影响，特别是“十年浩劫”，规划教育受到严重摧残。规划人员少之甚少，与实际需要差之甚远。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高等学校复办和增办规划专业，扩大招生，筹建新的学校，举办培训班和进修班，增加城市规划技术人员的来源，提高规划人员的质量。为此，当时不仅一些建筑工程学院设立城市规划专业，而且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也开始在地理系内设立城市规划专门组，为城市规划输送人才。我国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也开始研究城市领域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吸取西方城市规划教育的精华，总结提升我国城市规划教育水平，于1983年9月12~14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城市规划与规划教育”，并得到香港培华基金会的资助。30多家单位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吴良镛、李德华、宋家泰、李泽民、林克明教授等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润副院长。

会议主旨是动员更多的学科投入城市研究，培养城市规划人才。主要由香港大学郭彦弘教授、P·希尔斯(P. Hills)、A·R·卡思伯特(A. R. Cuthbert)、方国荣、叶嘉安、J·W·亨德森(J. W. Henderson)、J·R·希弗(J. R. Schiffer)介绍了英美、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规划以及规划教育，介绍了行政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内地学者也发表了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多数与会人员认为，西方的经验可借鉴，但必须与国情结合。对于我国来说，目前首要任务是要采取多种方式、多层次培养城市规划人才，满足数量要求。规划人才结构要多元化。理科经济地理专业，工程院校城市规划专业，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门化培养城市规划人才，各专业要突出自己的核心，保持自己的特色，应有各自的课程结构体系。城市规划专业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城市规划教育的课程必须由多学科的内容组成。社会科学中许多学科对城市问题曾作过大量有益的研究和发展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城市规划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知识是城市规划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知识之一。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都可以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地理学。地理学与城市与区域规划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最明显的是它们都以空间分布及组织为学习及研究的基础。地理学的位置选择理论对城市规划的实体规划最为重要。地理学与城市及区域规划同属综合性学科，有着相似的系统分析方法。这次会议对刚恢复的我国城市规划工作及复办的规划教育有一定推动作用。

吴良镛教授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呼吁：应动员更多的学科、更多的学者投身城市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中来!

二、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深化城市规划教育的改革

198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推动市场机制全面引入,经济迅速发展。就像启动了大型水库的泄洪闸,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涌入较发达地区,由内地涌向沿海,由乡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人口每年净增1700万人,至1991年底,城市人口总数达3.5亿人,如加上由农村到城市的“暂住人口”,上述数字会更加庞大。难怪当时世界银行的官员就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城市化的巨人。伴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用地也迅速向外扩展和蔓延,城市职能和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城市如此惊人的发展,城市规划从其观念、手段到队伍准备都是非常不足的。不少不合格的规划师也不得不参加规划编制,即使过去合格,在新的形势下,也未必能编制合格的城市规划。一方面,知道点西方社会的人们,强调要大、要高、要新、要国际化,向西方看齐;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人,包括部分决策者,缺乏城市意识,更没有了解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本质,谈不上按其规律建设管理好城市。

特别是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调节作用越来越大,直接的计划将越来越少。城市作为经济和各项活动的载体,将日益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作。这样,“国民经济计划是城市规划的依据”,“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决定城市性质和规模,按照计划的项目安排用地”的那种规划模式已无法运作。因此问题就会提出:城市规划如何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相适应?如何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宏观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如何适应城市发展速度,规划教育如何适应规划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与香港大学又于1993年12月14~17日举办了第二次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香港培华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港澳、英美加120多名学者特别是国内许多知名的规划界、地理界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题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城市发展、城市规划、规划教育。会上许多学者提出,城市规划应强调或更新五个观念,即市场经济观念、多学科或跨学科观念、动态观念、法制观念、以人为主体的观念,提出城市规划教育要树立大教育观,扩大办学规模,多学科多层次培养规划人才,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这是一次盛会,对我国城市规划及教育有相当影响。

会后出版了中英文各一本论文集,吴传钧院士为论文集写了序,在序中为这次讨论会提出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向:城市功能和内部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城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而日趋复杂;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决策者的介入,增加了把握和控制城市发展规划的难度;随着中国迈步走向世界,一些大城市的国际化已是必然趋势。在新形势下,应加强土地有偿使用与城市规划关系的研究,并不断探索新的规划模式;城市规划工作要注意协调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切实保护环境和文化古迹。在规划教育方面,要强调多学科的交叉,特别要加强地理与建筑工程和经济三种不同业务基础的城市规划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着力培养师资,加强核心课程的建设,借以提高规划人员的素质。”

三、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规划教育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信息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机制和规则的引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冲击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国际化大都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信息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等新的概念不断涌现,沿海大都市带迅速发展,城市间的协调竞争成为重要问题。市场化、法制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无疑使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发生巨大变化,城市规划体系更为复杂,更加强调城市生态环境,注重城市形象;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公众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更加强调城市遗产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既为城市规划指明了方向，又给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无疑将会给城市规划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再次联手于 2004 年 5 月 27~29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第三次城市规划教育学术研讨会。40 多家单位近 100 名学者出席了大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会议继续得到了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与规划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在学习西方发达社会中有益东西的同时，要结合我国实际，继承优良传统，走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

会上吴良镛院士发表了《寄语中青年城市学者》的信，信中特别希望中青年学者“要逐步养成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事物，从它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就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前及其发展；还有，世界是整体的，地区、城市，城与乡都是整体的，都是互相关联的，要培养树立整体观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本文的综述，希望能为历史的看待中国规划教育和三次规划教育研讨会提供一些线索，一点帮助。

参考文献

许学强，叶嘉安，闫小培. 中国经济改革与城市：发展、规划及教育.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许学强 叶嘉安
2005 年春

目 录

寄语中青年城市学者(序一)	吴良镛	3
适应城市发展要求, 探讨城市规划教育, 提升城市规划水平(序二)	许学强 叶嘉安	5

一、总论

全球化对城市规划与规划教育的影响	罗伯特·厄普顿	3
新时期的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	邹德慈	9

二、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2020 年中国国际城市发展思考	顾朝林 陈 璐 代媚媚等	15
全球化下的我国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优化	王发曾	25
全球化下的总部经济现象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周素红	36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乡村城市化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陈 烈 税 伟	41
创建“新知识城市”促进城市发展	孙骅声	49
城市的突围与新生——中国现代新城运动探研	郭红雨 蔡云楠	53
中国历史城市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阮仪三	57
我国地级城市技术进步水平的差异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	李 邨	61
全球化下的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探讨	赵炳时 赵云伟 刘剑锋	68
区域合作与泛珠江三角洲经济整合	陈振光	80
全球化下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策略探讨	李娟文 姚华松	94
西安的工业重组与空间转化	尹怀庭 沈小平 赵 哲	102
河谷型城市兰州空间扩散的管治研究	杨永春 吴文鑫	110

三、全球化与城市规划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规划	周春山 吴 菁 王丽斯	121
我国城市群区空间规划的新认识	姚士谋 陈振光	126
21 世纪城市形象的规划和管理	叶嘉安	132
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建筑	郑时龄	139
中国大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规划内涵及内容刍议	王兴中 秦瑞英	149
文化认同与城市规划的终极关怀	吕传廷 曹小曙 闫小培	159
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及规划教育的几点认识	毛其智	163
CBD 浪潮下城市传统商务区的发展定位——以广州市环市东商务区为例	林 耿	167
从“二元”走向“一元”——析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制度突破及其意义	李俊夫 孟 昊	177

生态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案例研究	吴智刚 缪磊磊	181
------------------------	---------	-----

四、全球化与城市规划教育

全球化与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的构想	孙 艳 林 琳	191
全球化：城市建设历史经验的共价与共享——规划历史与理论教学中对 西方体系的再认识	黄天其 黄 瓴	195
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培养方案修订的思考	陈秉钊	198
高校城市规划教育改革思路探讨	魏清泉 谢涤湘	202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全球—本土化(Glocal)思考	袁 媛 许学强 薛德升	206
裁剪大口袋——我国城市规划教育改革的思路	余柏椿	215
理、工、文结合办城市规划专业	刘 琦 林 琳 许 立	218
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课程体系设置初探	冯娴慧	223
立足西南，创建地域特色的城市规划学科体系——重庆大学城市规划 专业教育改革与实践的探索	赵万民 李和平	228
社会需求变化下地方院校的城市规划教育——以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城市规划专业为例	崔东旭 闫 整 张军民	232

一、总 论

全球化对城市规划与规划教育的影响

罗伯特·厄普顿(Robert Upton)

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

中山大学 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魏 开 译
香港大学 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易 虹

1 前言

全球化对城市规划与规划教育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全球化已经超越了专业人士的深奥理论以及传统主义者对现代经济变化的抗拒。虽然我们对全球化的作用机制和深刻含义尚不能完全掌握,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全球化正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推动力和要素。本文从一些特定的角度去探讨全球化作为一种推动力是如何影响规划实践与规划理论,以及这一影响在规划专业教育中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14、15世纪中国、葡萄牙、西班牙及其他国家航海者的探险已经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现象应该从以下两个领域与过去3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技术,尤其是通信和信息技术,另一个是世界自由贸易。正是这两种发展的共同作用,引起了全球性的变化,而其实质上是政治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通常由以下因素构成:变化引起的影响过程,变化的可掌握程度,以及变化所带来的有益和有害之处。本文将着重讨论在规划领域中这些变化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笔者想首先声明的是,全球化是一个高度复杂,因而难以理解的问题。我们都受到各自领域研究视角的限制。正如佛教中“盲人摸象”的寓言:每一个人都以自己摸到的一个部分来感知整个大象,最终对整个动物的全貌形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结论。虽然他们在部分方面上是正确的,但在整体上却是错的。同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上。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为尽量避免这一错误的发生,我们作为来自英国的观察者将从欧洲的角度集中注意力于有更多切身体验的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代表的学会不具备面向国际的视野——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团体,与众多国际团体保持着活跃的伙伴关系,拥有来自全球90个国家的会员,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会员。

全球化本身存在众多研究视角这一现实也同时引出了本文的一个观点:即我们也许需要将全球化视为一种趋势而非一个现象的全部。新结构和网络的发展,不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都必定是不均衡的。因此实际上应该同时存在一种称为“部分全球化”的现象,意指其结构和网络处于一种受控但不稳定的演化状态之中。当前的欧盟正是一个“部分全球化”的例子,欧盟正在扩张,而欧洲正处在适应这一扩张的过程当中,没有人知道这最终将意味着什么,而正如本文的主旨,规划在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如欧洲城镇规划师协会提出的“新雅典宪章”(New Charter of Athens)这类规划文件中。该文件对规划实践和规划师的角色作出了阐述。尽管该文件的框架产生于欧洲,但其内容并非针对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因而可以同样应用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2 规划实践

具体的说,全球化在以下四个方面给规划实践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 地区性的认识并回应全球化力量的需要
- 全球性的认识并回应全球化趋势和潮流的需要
- 认识上述回应内部及彼此之间制约关系的需要
- 发现并积极回应全球化中有益方面的需要

一个笔者生活中的实例可能用来说明上述中的第一方面。那是一场至今持续多年的辩论:关于英国的区域差异,以及为减少这种差异应采取的空间策略。类似的情况应该也存在于中国。简单来看,争论的焦点是英国年轻的、经济上活跃的人群不断地从西部和北部地区向东南部地区的移民,其必然结果是东南部的住房需求缺口巨大,而西北部的住房却被空置。这些问题一般都在英国本土的范围内被讨论,因为人们认为相应的政策方案和空间策略应该是在一个独立的国家背景下制定的,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通过制定国家空间战略,重新分配关键功能或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由伦敦转向西部和北部。

笔者完全支持制定英国国家空间策略,也同意应采取政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但我们认为这场争论缺乏对各方面力量本质的理解。现实情况是,现在的英国在经济地理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东南部的伦敦国际化大都市区(London global-city region)^①,主要由全球经济驱动;另一个是包括了整个北部和西部,在网络和经济联系上作为“欧洲边缘区”存在的一系列地区。虽然后者在经济发展上并非注定要被前者越抛越远,但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两者间也存在许多联系)。因此很明显,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简单地把投放于伦敦的资源转向英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资源更可能转向美国的纽约而不是英国的约克。我们的观点是,在考虑一些重大的地区性问题时,全球化经济的运作方式有时会被规划者和决策者忽视。

如果地区性问题有时都难以明了,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全球化趋势和潮流就更加难以把握了。这一点在联合国人居署发表的新世界城市论坛倡议书中有很好的反映:

“在1950年,2/3的总人口居住在乡村。到2050年,2/3的总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现在,全球人口的一半,30亿人居住在城市。在1950年,纽约大都市区是全球惟一拥有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地区。现在,已有20个如此规模的城市出现,更多类似的大城市正在形成,其中绝大部分将位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个小得多的时间尺度来看这一变化,则每24小时就有18万人出生或移民成为城市居民。尽管这种发展速度和压力很容易使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但全球化力量带来的地区现实需要我们提出策略予以估计和应对。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正与其他专业团体积极合作,为2006年将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城市论坛作准备。我们希望这一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更多的规划师可以团结起来,帮助实现和发展人居署提出的“开放式的智囊团(open-ended think tank)”的概念和巨大潜力。而且这一平台也将有助于将宏图 and 梦想变为公平的、可行的,而且是互惠的实现空间规划的方法。

由此我们将转而讨论制约关系的问题,在每一个规划项目中,巨大的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而解决问题过程中规划所扮演的角色又往往是模糊的。在此我们借用著名的布伦特兰(Brundtland)定义来说明这一问题:“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文字简练优雅,但它却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观念,并且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是,当我们走出理念层面时,就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这一强有力的号召并未包括任何操作性的指引。布伦特兰从“环境优先”到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需求中抽取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如何设立适当的系统以评估和协调各种潜在需求间的冲突,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次,可持续发展虽然看上去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真正放之四海皆准的观念呢?亦或因为有些人认为它是发达国家置于发展中国家

^① 这一术语不同于Sassen的突出金融业、服务业和市场的“国际化城市”(global cities),包括东京、纽约和伦敦;它也不同于Hall的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大约有30多座。

身上的枷锁而开始受到抵制。至少在现在，我们无法确信可持续发展已是一个被全球接受的概念，它还没有成为规划实践的全球性的范式。

即使如此，可持续发展中部分的全球化主张也与规划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有两个原因。首先，“空间和地点”是各种矛盾冲突出现和等待解决的舞台，因此规划者必须包括其中。其次，虽然存在重重困难，但一个有限的土地利用的方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冲突，必须有一个将社会、经济、环境问题有效联系起来的框架。因此，即使可持续发展尚未成为被普遍接受或实践的观念，在众多希望实现这一目标的规划实践者当中，可持续发展确实给规划实践带来了一些重要挑战。

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可能存在另一个可替代的范式——反贫穷规划(pro-poor planning)。因其直接针对欠发达国家，它是另一个部分全球化的观念，但它与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有关。这一观念的倡导者们认为它与可持续发展或相关概念并没有矛盾。这一观念更为注重实效：强调感知的唤起、强调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强调发展能力建构等。反贫穷规划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惟一有可能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成功的规划实践观念。其源流可追溯到来源于实践主义学派(practitioner-academics)如德国人 Otto Koenigsberger 的“发展规划(development planning)”的实践。

反贫穷规划给可持续发展在规划实践中带来的挑战在于它怀疑甚至否定总体规划。它认为所有规划都是临时和可变的，重点在于哪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可持续发展必须形成一种纵观全局的、多尺度的方法，以使所有必要而复杂的联系、评价和平衡得以实现。

全球化给规划实践带来的并不仅是复杂性和冲突，而且带来了更大的希望。以欧洲为例，1999年5月，负责空间规划的非正式部长会议，即欧盟前成员国部长会议，在波茨坦(Potsdam)召开，提出了欧洲空间发展远景规划[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SDP)]。该会议将近十年的一场激烈争论推到了顶点。

ESDP的最终成果是一份击败了几乎所有规划者的文件。它不是欧洲的“总体规划”。它的主要观点大部分是抽象的：

- 建立一个平衡和多中心的城市系统以及新的城乡伙伴关系
- 对基础设施和知识的公平享有
- 可持续发展，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谨慎管理和保护

而且其文件本身也是“尚未装订”允许补充的。尽管如此，这一文件在几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空间规划的思想置于欧洲政策的中心，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框架根本无法获得或投放任何欧洲结构资金。它孕育了“领土融合”的观点，并将其带入欧洲宪法草案。它促使刚加入欧盟的十国将空间规划作为其实现发展过程中融合的重要手段。

现在，ESDP 是否应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关键在于所有 25 个成员国，或至少其中的核心国家，是否认同这是一种协调整体空间考虑与各地区政策的方法。如果 ESDP 被认可及开始修订，我们认为“ESDP2”很明显不能再采取“ESDP1”的那种“自上而下”方式。其思路应建立在一个新的欧洲政策制定特征之上，即注重各方参与和政策审视，尊重不同发展速度的“开放式的协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盟委员会并未获得空间规划的实际权力，但在地区和区域层面，已有大量的资源被投放到与规划相关的活动之中。欧洲背景下的空间规划并不只是一个宏观概念，而是已经被运用到区域和次区域层次的投资和协作中了。

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 Interreg(跨区域)计划。Interreg III 多年来投放了总资金达 48.75 亿美元于跨边界、跨国度、跨区域的合作项目中，以促进更好地融合。在该计划的执行中，空间规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Interreg 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欧洲空间监测网络(ESPN)。其任务是在各国空间规划团体间构成合作网络，分析欧洲的国家 and 地区发展趋向，以及为空间规划研究提供经济资助。

以上的多种形式，说明了规划实践正以超越国界的模式为欧洲的融合提供支持，并同时令自身受益。

3 规划理论

其次,法国 Aix 大学的 Alain Motte 的一句话令我们大为惊讶。他说“法国规划理论”并不存在。他认为法国的规划教育与研究界越来越多依赖于来自周边学科如社会学、哲学和地理学,及来自英语世界的文献。但在我们所指的“英语世界”,规划理论正在众多不同语言、文化和教育系统的共同推动下稳步地发展。这是部分全球化的另一个例子,它的出现并非基于当前的任何文化霸权,而是来自历史巧合。我们无法肯定在其他发展中的语言世界,如西班牙文和中文在何种程度上,在现在或未来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在英语世界,正有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利用一个共同的平台进行讨论和比较研究。我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来自于笔者作为《规划理论与实践(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编辑的体验。作为一本力求在广泛的比较或国际视野下联系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期刊,它的稿件来自全球除了南极之外的各大洲,其中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一部分来自非英语地区。由此带来有关规划理论的部分全球化的讨论:以上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规划理论某种程度上的全球化?

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美国 Cornell 大学的 Susan Fainstein 讨论了“规划领域理论探讨的复兴”,并定义了当前理论发展的三种主要模式。那么,这些模式在何种程度上显示出全球化视野的迹象呢?

Fainstein 的三种规划理论模式是:

- 交流模式(The communicative model)
- 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
- 公平城市(The just city)

交流模式的理论源泉主要来自两大哲学学派:美国实用主义和 Frankfurt 学派 Jürgen Habermas 的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思想。其代表包括 John Forester(美)的“协商的规划者(deliberative planner)”和 Patsy Healey(英)的“协作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另外,受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法)影响的理论家 Bent Flyvbjerg(丹麦)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观点,强调权力关系的重要性。

除了从如南非等国家得到一些资料外,交流学派及其对手的理论看来主要以北美和欧洲的思想和实践为根基。实际上我们认为该学派一个主要的特征在于它没有或无法注意到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为一学派所吸引,但我们希望看到大家在与非欧美规划背景相联系方面作出更多地尝试和努力。如此,交流模式方能成为全球规划研究者共享的理论,而不再是简单地游离于规划实践之外。

新城市主义比其他模式更像一个北美的概念。它提出从北美之外的传统城市聚居模式中汲取经验,而这一主张也在“从芬兰到菲律宾”的世界各处被实践着。新城市主义的一些宽泛的原则,如良好设计的重要性和对场所和可达性的感知等,一定程度上是有普遍意义的。但其背后对城市和非城市的界定非常的美国化,而一些核心观点,如“横切”——“穿越一系列环境的地理横断面”展示出层级的变化——对我们英国而言几乎完全是在美国人口密度条件下,对美国区划问题的一种美国式反应。因此我们很怀疑新城市主义在获得全球认同的方面到底能走多远。甚至我怀疑它是否确实构成了一种规划理论,或仅只是一种特定的城市设计潮流。

公平城市模式我认为有大得多的全球反响。正如 Fainstein 所认为,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从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引入的分析方法。因此,虽然它并不一定是全球主流的方法——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全球的散播要快和远得多——但它是一种融汇了世界上众多学者智慧和众多学术传统的方法。

笔者认为公平城市模式突显的真正问题并非其哲学上的分析基础,而是其目标——力求为一种标准化的议程建立基础——这种对标准化议程的追求同样出现在可持续发展和反贫穷规划中。这种标准化的期望为许多规划理论所共有,尽管我们也同意范斯特的观点:“交流模式规划理论通过建立一些总体性的程序规范,而非提供实际的内容,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普适性。”所以我们推断,即使拥有同样期望的

各种规划理论仍被局限在各自的视野之中，对标准化的期望也许是真正显示全球化影响的表征。

我们猜想全球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规划实践者对规划理论的兴趣缺乏。但我们相信一个有趣的变化即将出现：规划的经验将不再针对某一国家而是具有全球特征，因而规划实践发展方向的意见将渐趋一致，这一点将成为规划理论探讨的新焦点。这一感觉来自于越来越多的空间规划实践。在本文中，我们反复提及空间规划，因为与城市规划，甚至土地利用规划相比，空间规划作为一种术语既可以被指作对目标的表达，也可以指作一种定义。

作为对目标的表达，空间规划指的是：

- 拒绝狭隘的土地利用方法，不将自己视为简单的行政管制工具的一种实践
- 努力令二元分化的规划重新弥合的一种实践——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规划被理解为城市化和战略规划两个相对独立的实践领域
- 关注整体空间政策与地区发展政策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实践
- 着重于可行性和目标性，而不是简单的规划土地利用的一种实践
- 既关注固化的空间，也关注流空间的一种实践。流空间尤指区域和更大尺度的空间，其中流代表动态的和具有不确定性的各种变化
- 具有清晰的多尺度观念，意识到区域与地方的复杂关系的一种实践
- 将规划实践者自己视为推动者而非拥有者的一种实践
- 认识到争论问题背后不仅有现实，而且有价值观，并明白这些价值观是需要被明确和被讨论的一种实践

我们认为这种正在涌现的实践虽然尚未全球化，但确实代表了国家间壁垒的消融。考虑到以上提及的各个方面，空间规划应该是一种超越地区或国家经验的实践，它应该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规划中自由地吸取着经验。长远来看，它应当代表了规划实践和理论界最重要的全球潮流。

4 规划教育

如果在规划实践和理论领域存在全球化的潮流，那么规划教育领域必然有所反映。同时，一些额外的全球化因素也对规划教育和规划职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首先，学生在海外留学接受教育的兴趣与能力不断增长——英国的许多规划院校就很欢迎他们。

其次，学生毕业后到外地寻找工作和获得工作经验的兴趣和积极性不断增长。例如，因为英国严重缺乏规划师，伦敦规划工作的正常运转正靠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持续流入的规划人才支撑。

第三，教育实践的变化：远程教育的持续增长，互联网技术、电子教育的不断进步意味着学生在决定于何处接受教育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第四，教育系统之间某种程度上相容的倾向：在强调转向 3-2-3 学士/硕士/博士结构的 Bologna 会议的促成下，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的教育模式正逐步统一。

第五，终身教育作为规划教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大：终身教育不仅是一个与个人的持续专业发展有关的过程，而且也允许在更广的视野中明确个人的需求。相应的，通过旅行和丰富的资料，个人所拥有的全球化经验和兴趣正在不断增强，因此终身教育本身将构成全球化的影响之一。

总体来看，这种全球化的倾向给规划教育带来了多大的挑战呢？这其中潜藏着众多的影响。为了突出重点，在此我们仅着重讨论一个我们认为非常基本的影响。近年来笔者所在的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界定作为规划师应具备的能力和知识。这一过程始于 2001 年皇家城市规划学会提出的报告，《规划的新前景》（New Vision for Planning）。这是一个致力于促成前文描述的实践意义更为广泛的空间规划观点的报告。随后成立的皇家城市规划学会教育委员会以该报告为起点，开始重新审视我们规划教育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假定一定要改变什么，而是立足于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教育委员会对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教育、资格评定、会员政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其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它对《规划的新前景》思想的深化，将空间规划实践所依托的基本理念作